

21世纪

高等学校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明清小说名著导读

修订本

陈文新 汤克勤 著

本书是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
《红楼梦》、《儒林外史》、
《隋唐演义》、《阅微草堂笔记》
等十一部明清小说名著的导读。

导读不仅触及学术果
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
而且以清新的文笔，
安顿，独特已见，富于
个性地展现出名著的魅力。

其厚重的内蕴和举重若轻的表述
将带您进入如饮醇酒的境界。

作者学识丰富，眼光敏锐。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21 世纪高等学校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http://www.wdp.com.cn>

明清小说名著导读

修订本

● 陈文新 汤克勤 著



前 言：陈文新 著 主编：陈文新 副主编：汤克勤 责任编辑：陈文新

武汉大学出版社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中文专业及相关专业本科生的通识教育教材，也可供从事明清小说研究的学者、爱好者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小说名著导读/陈文新,汤克勤著. —修订本.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10

21 世纪高等学校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ISBN 978-7-307-06242-9

I. 明… II. ①陈… ②汤… III. 古典小说—文学欣赏—中国—明清时代—高等学校—教材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3863 号

责任编辑:王雅红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支 笛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崇阳县天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8.5 字数:224千字

版次: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6242-9/I·337 定价:15.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顾海良
刘经南

委员：陶德麟
韩德培
马克昌
谭崇台
刘纲纪
朱 雷
冯天瑜
彭斐章
郭齐勇
陆耀东
杨弘远
查全性
宁津生

21世纪

高等学校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聊斋志异》、《隋唐演义》、《儒林外史》、《红楼梦》、《阅微草堂笔记》等十一部明清小说名著的导读。作者学识丰富，眼光敏锐，其导读不仅触及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且以其清新的文笔，阐幽发微，独抒己见，富于个性地展现出名著的魅力和价值。其厚重的内涵和举重若轻的表述将带您进入如饮醇酒的境界。

总

序



顾海良

进入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形成的共识之一，就是要着力教育创新。教育创新共识的形成，是以对时代发展的新特点的理解为基础的，以对当今世界和我国教育发展的新趋势的分析为背景的，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任务为目标的，深刻地反映了高等教育确立“以人为本”新理念的自然要求。

教育创新的首要之义就在于，教育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要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各类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要相适应，努力造就具有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全面

发展的人才。为了达到教育创新的这些要求，高等教育不仅要实行教育理论和理念的创新，而且还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特别要注重学科与专业设置的调整和完善，形成有利于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和提高国民经济水平发展的学科专业和教学内容；要注重人才培养结构的优化，形成既能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各级各类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又能体现和反映高校优秀的办学特色、办学风格和办学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教学创新的这些措施，必然提出怎样对传统意义上的以“学科”、“专业”为主体的教育教学结构进行整合，并使之与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通识”教育相兼容和相结合的重大问题。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中的“专”、“通”关系问题，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至于与“专业”教育相对应的“通识”教育的思想，出现得更早些。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与“自由”教育相联系的“通识”教育的思想。这里所讲的“通识”教育，通常是指对学生普遍进行的共通的文化教育，使学生具有一定广度的知识和技能，使学生的人格与学识、理智与情感、身体与心理等各方面得到自由、和谐和全面的发展。

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曾经经历过以“通识”教育为主、以“专业”教育为主，或者两者并举、并立的发展时期。从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来看，早期的高等教育似倚重于“通识”教育。随着经济、科技和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高等教育也相应地细分为不同学科、专业，分别培养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专业”教育的比重不断增大。20世纪中叶以来，经济的迅猛发展、科技的飞速进步、知识的不断交叉融合，使学科之间更新频率加快，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并存，“专才”与“通识”的需求同在。但是在总体上，“通识”似更多地受到重视。这是因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应该

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应该具有更为宽厚的知识基础和相当广博的知识层面，应该具有更强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多方面的交流能力。显然，仅仅依靠知识领域过窄的专业教育，是难以培养出这样的人才的。

我国大学本科教育专业一度划分过细，学生知识结构单一，素质教育薄弱，人才的社会适应性多有不足。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和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家和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类型和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对人才的规格和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划分过细的专业教育易于造成人才供给的结构性短缺。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我国加入 WTO，对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课题，继续走划分过窄、过细的专业教育之路，就可能出现一方面人才短缺、另一方面就业困难的严峻局面，将严重阻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将使我国高等教育陷于困境。我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和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已经深切地认识到这种严峻的形势。教育部前几年就在多方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推出了经大幅度修订的新的本科专业目录，使本科专业种类调整得更为宽泛些。各高等学校也在进一步加大教学改革力度，研究和修订教学计划，改革教学内容，努力使专业壁垒渐趋弱化，基础知识教育得到强化。这些都将是利于学生拓宽知识面，涉猎不同学科和专业领域，增强适应能力，全面提高综合素质。

在高等教育“通”、“专”关系的处理上，教育创新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通过教育创新，一方面能构筑高水平的通识教育的平台，另一方面也能增强专业教育的适应性，目的就是做好“因材施教”，实现“学以致用”。在这一过程中，除了要解决好选人制度即招生制度创新和教师队伍建设创新外，还要注重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方法，以及教材建设等方面的创新。武汉大学有着坚持教育教学改革的优良传

统，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方法改革、教材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努力。学校投入大量的精力和经费加强名师、名课、名教材建设，其中通识教育指导选修课程建设得到全国许多高校教师的积极支持和高度赞赏。

近些年来，我们经过精心组织与策划，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套通识教育系列教材，力图向大学生展示不同学科领域的普遍知识及新成果、新趋势或新信息，为大学生提供感受和理解不同学术领域和文化层面的基本知识、思想精髓、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为大学生日后的长远学习提供广阔的视野。我们殷切地希望能有更多更好的通识教材面世，不仅要授学生以知识、强学生之能力，更要树学生之崇高理想、育学生之创新精神、立学生以民族振兴志向！

(作者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第一章 《三国演义》导读	1
一、《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	1
二、《三国演义》的文体构成	5
三、《三国演义》中的“三奇”、“三绝”	16
第二章 《水浒传》导读	30
一、《水浒传》的成书过程	30
二、《水浒传》题材及价值内涵的多元性	40
三、《水浒传》的人物形象	47
第三章 《西游记》导读	58
一、《西游记》概述	58
二、《西游记》所确立的审美规范	62
三、《西游记》的人物形象	73
第四章 《金瓶梅》导读	83
一、《金瓶梅》概述	83
二、《金瓶梅》所确立的审美规范及其在 小说史上的影响	87
三、西门庆：平庸的市井浪子	95
第五章 “三言”、“二拍”导读	100
一、话本小说的基本知识	100

二、“三言”“二拍”概述	103
三、“三言”“二拍”的人物形象	118
第六章 《聊斋志异》导读	124
一、蒲松龄的生平	124
二、《聊斋志异》的情感世界和审美特征	126
三、《聊斋志异》的人物形象	134
第七章 《隋唐演义》导读	139
一、《隋唐演义》的作者和成书源流	139
二、《隋唐演义》的基本品格及其小说史意义	142
三、秦琼：从时乖运蹇到功成名就	166
第八章 《儒林外史》导读	172
一、吴敬梓的生平	172
二、《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	175
三、《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	185
第九章 《红楼梦》导读	196
一、曹雪芹生平及《红楼梦》的作者问题	196
二、《红楼梦》对人情小说传统的扬弃与超越	202
三、《红楼梦》的人物形象	211
第十章 《阅微草堂笔记》导读	228
一、纪昀的小说观念	228
二、《阅微草堂笔记》与中国叙事传统	231
三、《阅微草堂笔记》中的狐	244
主要参考书目	249

第一章 《三国演义》导读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章回小说，也是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历史演义即长篇历史小说之一。

一、《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

《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历史资料的积累阶段。这方面的历史资料，主要是晋陈寿的《三国志》和刘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的注。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了二百多种魏晋人的著作（今多已亡佚），其中有大量的野史别传。这些历史资料具有下述几个特点：资料完整、详备，凡属三国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有较为充分的记载，并对历史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某种原则性的解释和说明；若干野史片断颇具小说意味，如《曹瞒传》之叙少年曹操；品评人物忽视道德而注重才干。

第二，民间流传阶段。民间流传主要是指民间的“说话”（讲故事）和民间的演戏。宋代“说话”之“讲史”门中有专说“三分”的艺人（如霍四究，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现存的资料有两部元代刻印的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金元时期戏曲舞台上出现了大量的三国戏。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等记载，元杂剧中有六十多种三国戏，现存有《关大王单刀会》、《刘玄德独赴襄阳会》等21种。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其特点是“俗”，具体表现为热闹有趣的故事、诙谐幽默的风格和

异常简明的道德观念。

第三，文人改编阶段。《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这有确凿的文献作为依据。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其特色正如高儒《百川书志》所说：“据正史，采小说，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警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民间文学的积累，加上文人作家的再创作，终于孕育出了《三国演义》这部伟大的作品。

与《三国演义》成书相关且众说纷纭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即《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罗贯中的籍贯和《三国演义》的版本变迁轨迹。

《三国演义》的成书时间问题在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推断其作者罗贯中大约生活在元末明初（约1330—1400年），据此，《三国演义》也应该成书于元末明初。1931年，郑振铎、马廉、赵万里在宁波发现了明代天一阁蓝格抄本的《录鬼簿续编》，其中有这样的记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至正甲辰”即1364年，距元亡仅四年。这一记载与鲁迅的论断吻合。从此，“成书于元末明初”说得到学界公认。但“元末明初”是一个宽泛的时间概念，假定元末包括二三十年，明初包括三四十年，加起来约为70年左右，未免缺少准确性。一些学者不满足于笼统地说“元末明初”，试图获得更精确的结论，经过研究，提出了五种成书年代说：其一，“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章培恒、马美信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的前言，袁世硕的论文《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元人罗贯中原作》（《东岳论丛》1980年第3期）据书中小字注提到的“今地名”除偶有误用，几乎全与元代行政区名称相符等情形，断言其成书在元代中后期。杜贵晨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

考》(《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征引明初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一则,为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其二,“成书于元末”说。陈铁民的《〈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周兆新的《〈三国演义〉成书于何时》(收入《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以不同的证据证明了这一观点。程毅中的《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也认为《三国演义》“大致定稿于元代”。其三,“成书于明初”说。周楞伽、王利器、欧阳健等均持此说。其四,“成书于明中叶”说。张国光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张志合的《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李伟实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吉林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均持此说。其五,“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周邨的《〈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群众论坛》1980年第3期)提出此说,至今无人响应。关于《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这五种说法,各有其理由。我们认为,较稳妥的表述依然是:《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①

关于罗贯中的籍贯,较有影响的说法有三种:一是“东原(今山东东平)”说。刘知渐的《重新评价〈三国演义〉》(《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王利器的《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上篇(《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期)、沈伯俊的《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等均持此说,其依据是,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庸愚子(蒋大器)序称罗贯中为东原人,另一些明代《三国演义》刻本也认

^① 关于《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罗贯中籍贯和《三国演义》版本的说明,参考了沈伯俊著《三国演义新探》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定罗贯中是元东原人。二是“太原（今山西太原）”说。自《录鬼簿续编》关于“罗贯中，太原人”的记载于1931年被发现以来，一直是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几部影响较大的中国文学史，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均主“太原”说。三是“太原即东原”说。刘颖的《罗贯中的籍贯——太原即东原解》（《齐鲁学刊》1994年增刊）认为《录鬼簿续编》所说的“太原”，很可能指东晋、刘宋时期设置的“东太原”，即山东太原，与“东原”实为一地。杨海中认为，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东岳论丛》1995年第4期），杜贵晨的《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辩论》（《齐鲁学刊》1995年第5期）对此有进一步论述。此外还有浙江杭州、江西庐陵、浙江慈溪等说法，但影响较小。

关于《三国演义》的版本，其复杂性已经引起学界重视。以往人们对这种复杂性缺乏了解，一般认为嘉靖元年（1522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接近于罗贯中的原本，或者就是罗贯中的原作；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是由嘉靖元年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在《三国演义》众多的版本中，嘉靖元年本和毛宗岗评本是真正值得重视的版本。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各种小说史、文学史所论述的《三国演义》基本上就是就毛评本而言，只在需要时附带提及嘉靖本。近年来，学术界对《三国演义》的版本情况作了相当深入、细致的研究，日本的小川环树、金文京、中川谕、上田望，澳大利亚的柳存仁、马兰安，英国的魏安，国内的张颖、陈速、陈翔华、周兆新、沈伯俊；都在这一领域花费了大量心力。经过他们的研究，有四个事实已得到足够关注：其一，《三国演义》的各种明刊本并非“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诸本《三国志传》是自成体系的（见沈伯俊《校理本三国演义》的《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其二，“嘉靖本尽管刊印的时代较早，但它仍然是一个明人修订本，不能代表罗贯中原作的面貌”。那种把嘉靖本说成“罗氏原作”的观点难以成立，倒是《三国志

传》可能更接近罗贯中的原作（周兆新《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其三，从版本形态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的版本可以分为三个系统，即《三国志传》系统、《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和毛本《三国演义》系统。其四，《三国志传》的一些版本中有叙写关索和花关索的情节，这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所没有的。

二、《三国演义》的文体构成

文化惯例是文化传播的前提。小说设计及其实施以文体为媒介，而文体是社会群体的资产，群体的价值观念和思考方式都隐寓在文体之中。当小说家选择适合其作品的文体时，在某种程度上，他已失去了自我控制——文化惯例渗入他的文体，以至他的个人表达必定带有附着于他所选择的表达方式的社会意义。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主题）众说纷纭，几度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争议。各种不同的见解，从整体构成的角度看，其实并非尖锐对立，倒是互相补充的成分居多。大家之所以各持己见，其原因之一，在于忽视了下述事实：《三国演义》是一部累积型的创作，历史学家、民间艺人、小说家等先后参与了其创作过程，因而其文体不仅不是严格统一的，并且小说中的价值体系随着文体的更替递嬗也在变化之中。看不到这一点，反而固执地视某个侧面为小说全体，盲人摸象，理所当然会产生误解。

《三国演义》的文体，概括说来，大致有三种：准纪事本末体、准话本体和准笔记体。就一般情形而言，记叙曹操与董卓、袁绍、袁术等的纠葛，偏重准纪事本末体，如官渡之战；而当涉及刘备集团时，则较多采用准话本体，如赤壁之战、七擒孟获；准笔记体通常属于局部的点缀，如管宁割席分坐，杜预《左传》之癖。这三种文体，它们处理题材的方式相异，传达出的意蕴也各有侧重。《三国演义》熔三者为一炉，遂成为集诸种文体之大成的不朽

巨作。

历史编纂在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从《左传》的编年体，到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再到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纪事本末体，历史著作的外在形态发生了三次大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区别无疑是明显的，编年体强调时间的顺序，纪传体强调人物的性格，纪事本末体强调事件的完整，但它们又有非常一致的追求：第一，处理题材的方式应有助于给人“实录”之感；第二，通过对事实的安排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或因果关系，从而为后世提供借鉴。由此衍生出题材处理的三个特点，即回避直接心理描写；人物语言以理性化见长；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三国演义》的准纪事本末体也不例外。试加缕述。

应该说，“实录”只能视为历史学家的真诚动机，被叙述的历史与原生态的历史无论如何是有距离的，这是因为叙述过程即选择过程，历史学家不可能滴水不漏地将生活细节照录下来；同时，记叙者无法亲临现场逐一观照他试图记录的生活场景的每一个局部，他必须动用自己的想象能力。但是，历史学家既然以“实录”为秉笔原则，也就不能不遵守相应的规范，即作者只能报告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因为这是可闻可见的，而不应该直接陈述人物的所思所想，因为这是无法观察到的。这当然会带来遗憾：读者对于某些人物所采取的行动背后的真正动机不甚了然。可是，尽管如此，中国的历史学家仍然谨守不作直接心理描写的规范，宁愿有所遗憾也不以牺牲实录原则为代价。《三国演义》中同样不乏这种情形。比如，曹操在打败袁绍后，曾为之设祭，流涕不已，并“以金帛粮米赐绍妻刘氏”。曹操的这一举动，是装腔作势，还是真心诚意？读者的意见向来是不一致的。我们可以设想，要是作者能揭示出曹操行动后面的心理原因，那么读者中间就不会有什么分歧了。

也许有必要指出，在部分准话本体章节中，《三国演义》往往能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比如第九十三回，姜维被孔明的反间计逼得进退无路，“维寻思良久，前有关兴，后有关兴，又无去路，只